■对 话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董夏青青：在场和注视

□本报记者 行 超

2020年底，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非虚构作品《我，只是刘虹位》，作者是董夏青青。董夏青青是军旅小说家，而刘虹位是国内一支乐队的吉他手，身份的巨大差异，让我很难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我猜想，或许，董夏青青是在刘虹位的经历中收获了一种珍贵的共情——这两个多少有些养尊处优的城市青年，一个选择深扎在祖国边境线上写作，一个前往县城参与扶贫工作，他们共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一群陌生人的身上重新认识了现实，再次发现了生命的意义。

董夏青青是早慧的作家。12岁出版专著，学生生涯中已经获得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2009年，大学毕业的董夏青青主动申请前往新疆工作，此后，她身着戎装的身影出现在边疆的辽阔与苦寒中。在这里，董夏青青反复注视着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基层官兵，一次次为他们隐秘而伟大的精神力量所感动。也是在这里，董夏青青完成了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的创作。2022年，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在阿吾斯奇》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以下是董夏青青的专访。

董夏青青

行 超：董夏好，祝贺你获得这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除了早期的校园主题，之后你的写作一直根植于军旅生活。我们熟知的许多经典军旅作品大都是以战争为背景的，而年轻一代的军旅作家，整体上成长于和平年代，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旅文学应该更多关注哪些问题？

董夏青青：谢谢鼓励！如你所言，年轻一代的军旅作家和参军入伍的青年人，整体上成长于和平年代。我在湖南长大，幼时对军人最初的印象就是每当洪水过境，军人都是大坝上最牢固的一道防线。老百姓将解放军亲切地称呼为“人民子弟兵”，一方面指军人们来自于人民，一方面指军人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担当。还有汶川地震时，军人们逆行冲入震区抢救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时刻，带给我很深的感动。我在新疆走边防的过程中，也看到很多连队和边地百姓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的故事，由此更感到军旅文学一定要尽可能全方位捕捉素材，将军人们在每一道战线、每一个点位上的牺牲奉献和智慧才情充分书写。不能因为当下和平，就觉得题材不够“劲”。国家无战事，军人有牺牲。如今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当下的安宁，正是因为新时代军人们加紧练兵备战，时刻做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准备。习近平主席强调：“能战方能止战。”军人们为了“能战”而做的艰辛付出，同样值得记录。

行 超：2009年，你主动申请前往新疆，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十年。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中的作品也基本都来源于这段时间的观察。为什么大学毕业时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段生活给你的写作和人生带来了什么改变？

董夏青青：我是“80后”，赶上了文学热潮的“后浪”。从小就翻家里的藏书，向往理想主义的生活。幼时到长沙生活后，又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大学四年，系里经常请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等到学校讲课，他们鼓励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要扎根基层，在民间汲取创作养分。其中有一位老师的课讲得格外精彩，他告诉我们这些军队学员，如果要成为有出息的作家，成为一个有着与众不同写作风格的文学新人，就要敢于到新疆、西藏高原大漠中这些祖国最艰苦、也是最美、最有艺术特质的地方工作、生活。大学毕业时，我想“以文学为志业”，于是照猫画虎打算“到人间去”（高尔基），乐颠颠申请赴疆，寻找写作的富矿。只是没想到，作为独生子女的我，去到边疆地区工作、生活，最先承受不了的是我的父母。在新疆十年，我在新疆独自工作和生活，在现实和精神层面“断奶”，过程不好受，但对于写作来说，这让我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开阔的远处，收拢精力来观察、打量他者，重新审视过去“熟视无睹”的人生内容。

这段工作经历也是我心性的重要塑造期，可能在父母跟前需要十年才能获得的成长，在这里三五年内就完成了。这期间，我每去到一个边防连队与战士聊天交流，都会感到如一位战友说：“好像他们都是一个个诗人，用极短的时间就参透了人生的道理。”在新疆的经历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石，我也在那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以前只感到我需要父母、长辈和朋友的爱与关照，在那里，我感到战士们也需要我，他们关心和爱护我，因为我的在场和注视，也因为他们希望我能将他们的经历讲给更多人听。我也很想通过新时代戍边官兵的故事，让更多读者获得面对困顿和磨砺时的勇气，精神更有韧性。前些天，一位高三的妹妹说做语文考卷时，在“阅读理解”一栏中读到了《冻土观测段》的节选，这叫我有了愿望成真之感。对于常年戍守边关的军人来说，每天面对荒无人烟的雪山戈壁，忍受极限环境是一方面，最难忍受的是没有通讯信号，担心被人遗忘或忽略，如同置身宇宙边缘。但当这些优秀的中学生阅读和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并在内心向他们不惧艰险的无私品质深深致敬，也就证明了战友们理想的意义。

行 超：你的小说多是以国境线上的部队生活为背景的，尤其关注这里基层官兵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状况，比如《在阿吾斯奇》中的无名烈士、三班长，《冻土观测段》中的许元屹、《垄堆与长夜》中的刘志金、《科恰里特山下》中的李参，等等，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家国、历史、现实乃至责任、义务等问题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时，这个人该如何理解、如何背负——《冻土观测段》里的上等兵就面临过这个问题。小说写作中，你是如何处理宏大叙事与个人立场这一辩证关系的？

董夏青青：人艺的蓝天野老师曾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觉得这句话换到文学中也成立——没有小角色，只有被作者写“小”了的人物。想想这些年的写作经历，就是努力坚持最基本的“照实说”。所写的边防军人是我所见到的、交谈过的众多基层官兵的凝缩。他们纯粹、深刻的心灵质地和表述过程中不时迸现的思想火光，时常让我感到恍惚，甚至有时我会再抛出一个话题，来试探和确认他们思考的维度。结果每每令我信服，他们对于个人和时代之间关系的思索，常让我心生敬意——其实学校教育和军旅生涯的锻造，已使他们足够睿智，能看清自己在时代中所处和能够身处的“位置”，因此他们的情思，自然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氛围，也展现了这一代青年人在道德、智识等方面的基本特征。所以每当提笔，我都会告诫自己，别找机会抖机灵、满足虚荣，或者自作聪明代人发言，而应找来认知范围内最好的写作方式和方法，保证这些大时代中了不起的平凡人物所做的不平凡的事业得以呈现，且让人信服。只要诚实地观察和记录，就是像你所说的，当家国、历史、现实乃至责任、义务等问题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时，这个人该如何理解、如何背负，就能寻到写作的路径。

易卜生曾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每一个个体都是时代的“因”，众人精神状态的总和与积累推导出社会的“果”，如果先看“果”，反过来推测“因”，就可能落入编造，脱离现实的虚构就没那么有说服力了。

行 超：小说《冻土观测段》里有一个细节十分动人。牺牲者许元屹的母亲来到儿子生前所在部队，教导员问她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都可以向上级报告。她却只想知道儿子最后的表现是不是勇敢，她问教导员：“我儿子，他是英雄吗？”英雄形象一直是军旅文学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新时代的英雄，如何书写英雄？

董夏青青：你提到的这个细节，原型来自烈士陈祥榕的母亲，当时得知儿子牺牲后，她告诉部队的领导没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想问一句，儿子在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

我觉得“英雄”一词在军旅文学中的内涵一直在演变，经过几代军旅文学作家的开拓和积淀，以及大众认识的变化进步，时至今日，军旅文学和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和拓展。电影《长津湖》中，段奕宏的一句台词打动了很多观众——“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在读兰晓龙的小说《冬与狮》时，我也反复被这句话击中。这启发我们在书写新时代的英雄、在新时代书写英雄时，应当深入了解和思考其作为普通人和其身心当下性的一面，而不是“想当然”，一拍脑袋提笔就来。英雄有其生活的具体时代背景和周遭环境，正是通过具体描写其作为一个人的“普遍性”和其身上体现的时代特性，当他做出一件不平凡的事情时，才能更令人震撼和思索——同样是人，身处一致的环境，为什么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从而成为英雄？

行 超：读你的小说，我常常想起苏联作家巴别尔。巴别尔以战地记者般的方式写战争小说，叙事简洁，情感深沉，追求语词的准确性。我觉得你的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战争是人性的试炼场，面对其中时常出现的极端情境，有的作家选择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抒发，有的则趋向于现代主义的冷静、自控。你怎么理解这两种风格？

董夏青青：我很喜欢巴别尔的小说作品，从他的写作方法中得到很多启发。记得他曾说过，大意是一定要亲眼看到马辔头上缀的穗子，他才能安心下笔，来写骑乘这匹马的骑兵。这让我之后在观察时，也注重现实细节。同时他偏于冷静和自控的语调，也让我思考——既然他是不动声色的，为什么我仍能从中感到汹涌澎湃的情感？一种对人类命运整体性的悲悯？我想，也许正因为他做到了“不隐恶、不虚美”的前提。

另外让我感到惭愧的，是我崇敬的大作家，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他们都有能力一方面追求叙事和语词的准确性，一方面阐释哲理、抒情感怀。但我自知能力有限，写起来只勉力能顾上一头，因为我作为女性，观察细腻一点、心思敏感一点，感到有些许优势，所以横下心来，先躲进了您所说的——“趋于现代主义的冷静、自控。”

实际上，我也向往《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雄浑作品，托翁既能将故事人物写得生动精彩，夹叙夹议的思索也令人获益匪浅。但刚健的思辨是一种卓绝的能力，需要涉猎哲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学习才能具备一点底气，将来我会努力精进，希望有一天也能让自己的“风格”更丰富和多元一些。但有一点会坚持，就是坚信契诃夫所说，“简洁是天才的姊妹”。

行 超：我个人认为，你小说最珍贵的部分就是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基层官兵的关注和发现，没有扎实的生活和切身的感受，是不可能写出这些作品的。当下许多青年作家生活相对封闭，导致作品的视野不够开阔、主体比较单一，你觉得青年写作者该如何建立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

董夏青青：我想首先，作为文学工作者，都应站在生活的第一线，来切身感受大自然的万物、人们的悲喜，记录人的创造。如果只是和自己待着，凭空的虚构终究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

在新疆时，也接到过两位学妹的询问电话，说想到大西北来锻炼几年。我当时和她们说，可以做选择，但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受选择带来的全部后续。从我来讲，一次决定也让我的亲人承担了很多。青年写作者不必说一定要跑出去“讨苦吃”，但对于自身之外的人和事物，也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能敞开心界地真听、真看、真感受。不然即便去到一个陌生化的地方，看来看去还是只能看到自己，封闭和困于个人感受。“人民大众”也随处都可遇见，比方说我们的父母，如果善于提问和倾听，把他们的故事了解清楚，其实也能看到一代人的境遇浮沉，其中也有很强的“文学性”可以挖掘。

■新作快评 唐慧琴中篇小说《嫦娥奔月》，《钟山》2022年第4期

凡俗人生中的理想守望

□金赫楠

唐慧琴的中篇小说《嫦娥奔月》从主人公小石头突然查出绝症开始，围绕他和身边的几位亲朋，讲述了凡俗人生中一地鸡毛背后复杂的人情和人性，以及人们所坚守的理想与良善的微光。

小说表层故事线的叙述始终围绕着主人公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如何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安置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如何了结自己身处其中的纠缠恩怨。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石头、老张与葫芦娃三人之间在多年的交往中相互帮衬和陪伴，但终因现实的利益纠葛产生了矛盾，老实得甚至有些笨拙的小石头被精明能干的葫芦娃所“坑”，欠下一笔莫名其妙的十万元银行贷款，夹在二人中间的老张更是陷入诸多算计和为难中。如此种种，在这个过程里，小石头、小石头妻子以及最亲近的两个朋友老张和葫芦娃这四个人物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而表层故事之下深层意蕴的表达，恰就是人物们面对人生突发状况时的言行和选择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立场和人性底色。小说中，作者着落了相当的笔墨去写小石头本就狼狈艰难的生活在恶疾突降时的几近崩溃，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被命运突袭后的懵与痛，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对家人的牵挂眷恋——这原本就是极具普遍性的情感和经验，关乎小说的现实感和说服力。《嫦娥奔月》中的故事是沉重的，人物面对生的艰难和死的不甘，更面对人心和人性的复杂，然而小说结尾处的情节设置——小石头留下的那块一直珍藏、起名为“嫦娥奔月”的奇石——却让整篇小说在沉重基调之上轻盈起来，“嫦娥奔月”的隐喻和象征意味，凸显出凡俗人生中人们对理想的执念守望，更赋予这篇现实感很强的小说另一种轻盈克制的质地。

唐慧琴的另外一篇中篇小说《拴马草》，也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安置身后事的故事，围绕“夹葬”“排葬”这样极富中国乡土传统意味的地方丧葬风俗去写乡村女性的生前身后事，其实更是在写传统伦理规范下的北方乡村，这之中人的桎梏、压抑、挣扎和反抗，他们所承受的和自己必须自负其责的东西。从《日头、日头照着我》开始，唐慧琴的小说创作一直专注表现和描摹乡土生活，乡村里的人和事始终作为她写作的素材和情感根基。同样以书写乡土著称的作家关仁山曾这样形容其作品特点：“它是从生活里捞出的文字”——是的，从生活里捞出的，还冒着热乎气，饱满、新鲜，这是写作者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常年浸入生活的产物。而经验层面的丰盈以及经验表达中那种粗粝的震撼和生动，一度成为唐慧琴小说的高辨识度之所在。《拴马草》依然葆有唐慧琴以往创作中对农村生活方式、人情世故通透熟稔的那种经验优势，以及因此营造出来的作品毛茸的“身临其境”生活质地，但更展现出写作者于故事背后“抽身在外”的多重思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自觉。

而《嫦娥奔月》中，小石头直到去世还心心念念地要把自己名下那十万元贷款还上，作者在小说中展开的主人公的这份执念，所强调倒还不是现代契约意识，更多是建立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欠债还钱”的传统人生礼义和准则。从《拴马草》到《嫦娥奔月》，唐慧琴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一个长于乡土经验描摹的写作者，如何在粗糙、毛茸的生活中不断地发现和呈现温暖和清澈的诗意。

■短 评

记忆和语词指引归乡路

——读马陈兵《潮汕往事·潮汕浪话》

□桫 椤

现代散文的题材选择多与日常生活有关，对客观真实的追求某些时候也限制了自身的审美表达。为了获得更大的想象和表现空间，写作者不断在内容和视点上拉开与现实的距离。这样，记忆及其联想成为最常见的书写对象。毫无疑问，言说者自己的经历是最牢固和最有温度的记忆，而与身在的日常距离最远的就是童年生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故乡的写作在散文中最常见——书写个体生命最远端的、也就最具有想象可能性的个人回忆，不仅是写作的情感需要，也是文体发展的内在需求。

但是，无论是昔日泛政治化了的整齐划一的社会活动，还是今日网络时代同质化的信息接受，差异化的审美在散文中变得越来越稀缺，类同的题材和表达成为写作中的顽疾。在多少有些沉闷的散文现场，马陈兵的《潮汕往事·潮汕浪话》给我带来了阅读冲击。这部靠个人记忆、地方知识和乡愁情节交织成的散文文本，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了对故乡磅礴幽远的眷恋之情。作者以充满深情的回忆打捞记忆，对故乡乃至整体上的乡土生活展开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化审视，用一个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立场和传统的文史方法在纸上赋予“乡愁”以具体的形象。其情感内蕴由故乡山水、生活现场深抵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核，凸显了散文的文化价值及其规范的可塑性。

作者在开篇的自序中说：“任何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都首先必须对生命的诞生与成长有所交代。”潮汕乡下的故人、故事、方言和民间传说、风土人情构成了这部散文集的主要内容，串联起这些内容的则是作者的回忆，而追忆与倾诉的位置在当下——内容和叙说的姿态可看作是作者对故乡的“交代”。童年、少年时的快乐一次次被父母不断徙居的生活所打断，生活的艰辛、成长中的苦闷心志乃至强说之愁，时过境迁后已经被时间磨去了刺痛生命的锐利尖角；曾经鲜活而又激越的人生现场被打磨出情感的包浆，变成内心深处可供养育和安放乡愁的温润港湾。

这一过程的实现，既仰赖时间的自然流逝，更凭借作者回望故土时的沉吟、审视与反思。区别于惯常的抒情，马陈兵对故乡的情感既热烈又冷静，且多有理性的观照。他记得幼年时赤足走进经天窗投影下来的菱形月亮，多年以后回想这个情形也并不被感动裹挟，而是发出“那个小男孩和现在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的疑问，由此掀开记忆的帘幕，进入历史的世界中。从阿婆口中讲出的乌佬仔、白贼公的故事，到潮汕地区带水挟溪的地名；由来往密切、淳朴勤奋的加强叔，到曾勾起自己懵懂性别感的乡下女孩甜丸与甜粿，作者从传说、风物和人物身上一路寻觅和清醒地勾勒自己成长的印迹，那也便是走出故乡的履痕。

当然，这种对记忆的追述是在与当下的对比中进行的。在作者看来，“那时的天、地、夜晚和白天，真与今日大异”。从被禁止的风俗变化，到环境污染中“风水观念”的作用，“异”表现在相当多的方面。而作者的反思意识虽然来自后天现代观念的启蒙，但种子在童年即种下了。作者将土尾、成田、盐汀这些地方看作故乡，因是跟随父母的工作迁移而至，总是与当地人不同的，所以他观察和体味乡土的视角是有第三方意味的：“我在潮汕乡村出生、长大，但父母的出身、教育、职业和信仰，使我从未真正进入传统的乡村社会。”作者的身份意识相当清醒。

散文集的上篇《潮汕往事》钩沉记忆时尽管不乏交错的情节和恣肆的感情表达，但大体上还是一个线性结构，家庭和父母的影响是其中最重要的线索。及至下篇《潮汕浪话》，体例完全变化。作者自言是“作为向《马桥词典》致敬之作”而写的，“借若干潮汕方言词与风物互相生发，演绎地方人文历史”，但“演绎”“选材的原则与范围却也严格限定在我早年的成长经验与听闻”，这就使得上下编的文风及其内在的情感得以一致起来：它们都萌发于作者的人生和审美经验——这种经验又带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因为“作为现存最古老的汉语方言之一”，“几乎不同时间层次的中原古汉语及吴语、楚语等方面的语词，都汇集到潮汕方言之中”，而“当代生活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又为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创意的产生，恐怕与作者史学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尽管马陈兵并不专治语言史，但对方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相当敏感的，以至于秉持着“潮汕话是潮汕文化的主要代表和载体”的观点。

借助方言，我们得以窥见隐含在语词背后“出意表，得天机”般丰饶纷繁的潮汕文化景观。“潮汕浪话”中的“浪话”就是作者要讲清楚的第一个语词，我们不曾想到，被作者用“僻”“福”和“浮”来界说的日常俗语，竟然关联着一部潮汕地区的开化史。接下来的“浮氏物语”中的“物”字是当作表示行为的动词使用，而这一词性的变化过程彰显的却是潮汕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派。同样是“浮”字，搭配为“浮景”就成了“有行情、得好事、发了财、大快活”的含义，作者用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功力阐释这一说法，从汉武帝刘彻和李夫人，过杨太真、白居易后，追踪到带着五百童男童女浮海而去的徐福身上，进而抵达改革开放设立特区的时代，一句在当地司空见惯的话带出来的是波诡云谲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云。“吟唱灵魂”抓住“吟唱”这个字眼，写出了一篇韵味悠长的怀人散文，黄宗泽老校长的清吟浩歌不仅是他生命的“积习和独唱”，亦是一代传统知识分子贫贱不移志的骨气与襟怀……这些绵延久远且代有更新的“浪话”是潮汕文化的载体，更是指引作者打开记忆之门，重返故乡的标记物。

虽然自认与故乡隔了一层，但散文集《潮汕往事·潮汕浪话》仍然充盈着作者浓重的思乡情。马陈兵之所以会对故乡念念不忘，以至于郁积出“形而上”的“愁怨”来，断不只是因为标志故乡的那个地名，而是因为那里的自然养育了他的肉身，那里的文化涵育了他的精神世界。毫不夸张地说，是故乡给予了一个人最初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此游子背负着故乡的山水，用故乡赋予的道德行走世界。而故乡，则成为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放下的灵魂牵挂。